

# 不同的視角——臺灣聞一多研究論著的觀察與評述\*

Different Perspective: Survey and Commentary on Taiwanese Studies of Wen Yiduo

連文萍 (Lian Wen-ping) \*\*

## 一、前言

臺灣社會大眾對民國前期文人的認知，常來自國、高中《國文》教科書的選文，胡適（1891-1962）、徐志摩（1897-1931）、朱自清（1898-1948）、梁實秋（1903-1987）最為人熟悉。相形之下，聞一多（1899-1946）未受到重視，臺灣中文學界對聞一多的專論也不甚多，但有些文章能以不同的視角提出看法，特別是不同於中國大陸偏重頌揚的角度，因而成為聞一多研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。

本文分就國學、現代文學二端，觀察並評述臺灣學界研究聞一多的相關論著，包括專書、學術論文，兼及傳記、評論、序文等。各論著發表時間，上起 1966 年，下迄 2017 年。各論著之作者，以成長或定居於臺灣者

為主，若近年來許多海外學者在臺灣出版的相關專書，<sup>1</sup> 選題各具特色，也各有傳播影響，但未能代表臺灣觀點，故不列入討論。

## 二、國學角度——對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的討論與研究

聞一多的學力深厚，不論經學、古典文學、人類學、神話民俗等都有精闢見解，為學界注目，<sup>2</sup> 惟臺灣中文學界側重研究其《詩經》學，以下即以之為討論重點，由《詩經》選本到學術論文，按發表時間分別考察。

聞一多對《詩經》的闡釋深具代表性，臺灣許多《詩經》讀本會介紹其人、引用其說。如糜文開、裴普賢所著，曾用為大學中文系教材的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，在

\* 本文初稿宣讀於早稻田大學孔子學院主辦「日本聞一多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（2017.11.11-12），會後經節錄及修改，並承蒙匿名評審惠賜寶貴修正意見，謹致謝忱。

\*\* 作者為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1 如史景遷著，溫洽溢譯，《天安門：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2007）；聞黎明，《聞一多：涅槃的鳳凰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公司，2010）；婁曉凱，《衝突與整合——論具有留學背景的中國現代作家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公司，2013）；夢之儀，《紙上光陰：民國文人研究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公司，2013）；王冬冬，《1940年代的詩歌與民主》（臺北：政大出版社，2016）等。

2 如蘇雪林在 1957 年發表〈聞一多死於姪手〉（原載《自由青年》第 21 卷 6 期；收入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《文壇話舊》，頁 143-151，1969），頁 147，曾謂：「他（聞一多）想從這些學問裡發掘中國文化的根源，窺探出中國文化的真面目，他的路線是非常正確的，也只有聞一多的眼光、魄力，與其深厚的學殖，可以挑起這一副非常沉重的擔子。現收在他全集裡的『神話與詩』的論文廿一篇、『古典新義』論文廿五篇，考覈之精審，論據之翔實，論斷之明確，都是近代學術界所少見的，不惟郭沫若關於此類研究，萬不及他，便是顧頡剛也該讓他出一頭地。」

說解〈匏有苦葉〉時，引用聞一多《詩經通義》，其下〈評解〉有謂：

聞一多本是一位詩人一位學者。他寫的新詩很有名，他寫的考證文章，很有獨特之處。他對於《詩經·國風》，尤有專門研究，寫有《風詩類鈔》甲、乙兩編，《詩經通義·周南、召南、邶風》三編，《詩經新義》二十三則，和〈詩新臺鴻字說〉一篇。輯錄在民國三十七年上海開明書店所出《聞一多全集》的二四兩冊中。抗戰時期他任教西南聯大，勝利時他被共黨利用，在昆明演講，詆譏政府，被熱血的兵士拔鎗打死。這次，我們為寫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，各種參考書都要看，特地託友人在香港採購他的全集，沒有買到，不甘心，再託另一友人設法蒐購，最後他感慨地復信說：「跑遍全香港大小書局，不見蹤影，存貨也找不到一部……原來聞一多的書早已絕版，想不到他被共產黨利用而送命，共產黨卻不許他的書流傳。……」最近終於借到一部，把有關《詩經》研究的部分，仔細閱讀了一遍。他的《風詩類鈔》，只完成了一個粗糙的初步工作，《新義》和《通義》，則比較嚴正可觀。<sup>3</sup>

〈評解〉篇幅很長，難以全部引述，這是學界針對聞一多的珍貴發言，「被利用」、「詆譏政府」之類的描述，是臺灣 50、60 年代學界對聞一多的普遍判斷，<sup>4</sup> 而聞一多著作在臺灣難以購閱，亦是實情。<sup>5</sup> 此書對聞一多論著的評價為「嚴正可觀」，主要是指聞一多解讀〈漢

廣〉、〈行露〉、〈新臺〉、〈匏有苦葉〉諸詩，及考證周代嫁娶正時，皆有其獨特之處。但對其援用弗洛依德學說來解《詩經》則不以為然，謂：「他的《詩經》研究最顯著的毛病，在於濫用西洋人的性心理學」，「聞一多簡直把《詩經》看成一本性慾描寫的隱語書了」。<sup>6</sup>

吳宏一《白話詩經》曾連載於《中央日報》副刊〈長河〉版，是知名的普及讀物。書中說解〈汝墳〉，引用聞一多、陳子展等現代學者之說，並謂：

聞一多解釋「魴魚頰尾」時，更據《左傳》哀公十七年「如魚頰尾，衡流而方羊」一語，以及鄭眾對該句的注解：「魚肥則尾赤，方羊遊戲，喻衛侯淫縱。」說〈國風〉中凡是提到魚的地方，都是兩性之間互稱對方的隱語，沒有一首是實指的，而且他進一步把「王室」解作「王孫」，把「如燬」解作「性的衝動像火一樣激烈」，因此，這首詩在聞一多等人心目中，就變成一首涉及「性趣」的情歌了。事實上，聞氏等人的說法，在孔穎達的《毛詩正義》裡，已見端倪。只是孔《疏》引用鄭眾之說時，未曾附會，而聞氏等人則強為確指，說了一些「魴魚非實指，係稱男方」之類的驚人之語。我個人以為近人的新解，並非一無可取，但是，也不以為舊說一無是處。……<sup>7</sup>

吳宏一認為民國以來「由於受到歐西之學的衝擊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，說《詩》者往往勇於自是而輕於侮昔」，<sup>8</sup> 但對於聞一多的新解仍有所參酌，像解說〈匏有苦葉〉謂：「聞一多《詩經通義》說：『厲與揭，當

3 糜文開、裴普賢，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64 初版，1987 新版），〈國風·邶風·匏有苦葉〉，頁 161-162。

4 按，文中所引書信「共產黨卻不許他的書流傳」等訊息，頗有誤解，侯美珍，《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研究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 31 有所討論，可參考。

5 聞一多著作在臺灣遭查禁，李紀祥，〈書生報國，自定取捨——錢穆與梁漱溟、馮友蘭、聞一多〉（《鵝湖月刊》第 424 期，頁 10，2010 年 10 月）謂：「猶憶六、七零年代購買馮友蘭書，其封面必題曰馮氏、馮某、馮二難方可，聞一多先生與郭沫若先生之書，亦皆在書肆後廂禁中」。據筆者知見，聞氏著作在臺灣出版者，主要有《神話與詩》（臺中：藍燈出版公司，1975）、《楚辭斟補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1977）、《古典新義》（臺北：九思出版社，1978）、《詩選與校箋》（臺北：九思出版社，1978）、《死水·紅燭外二種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0）、《聞一多全集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9-2000）。

6 糜文開、裴普賢，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，頁 165、166。

7 吳宏一，《白話詩經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3 初版，2011 五刷），〈國風·周南·汝墳〉，頁 68。

8 同前註，〈前言〉，頁 7。

承匏言。深與淺，當承涉言。謂涉深則厲匏以渡，淺則揭之以渡也。」換句話說，詩人知道如何渡水，她所以不渡者，配合第四章來看，乃是『印須我友』，還在等待她的朋友的緣故」<sup>9</sup>，即直接引述《詩經通義》的書名及說解內容。

由糜文開、裴普賢與吳宏一的《詩經》讀本，可見臺灣學者對聞一多之說解，只要說得有道理，就會參酌接受，惟其援用弗洛依德理論來解經，仍為被批評的焦點。綜言之，《詩經》讀本引述聞一多之說仍較零散，讀者對其說《詩》及其學者形象有所好奇，但多為片面印象。

就學術論文而言，因為政治因素，臺灣中文學界早期未見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的專論，多是約略述及。如1976年裴普賢的〈詩經時代嫁娶季節平議〉，徵引聞一多的看法，並予評論：「所論雖有未當，且不知春秋時代四時聽婚，《詩經》中亦有夏婚，是其疏失；但其論《詩經》以春婚最多，秋婚次之，追論初民婚期與農作之關係，以為春秋合男女之俗，乃太古遺風，其說亦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」，<sup>10</sup>可見聞一多之說是研治《詩經》不可忽略的重點。

1981年有趙制陽的專論〈聞家驊詩經論文評介〉，此文篇名用「聞家驊」，〈前言〉則以括號指明：「聞家驊（一多）先生，為民國二、三十年代知名的學者」，<sup>11</sup>可見不無顧忌。論文先定位「聞氏研究經義，以上古文

字的考證為手段，以否定舊說獨創新義為目的。博辯閎議，鉤玄發微，讀之令人動心；然是否已臻於定論，則由於讀者見識有高下，觀點有差異，未必有一致的看法」，<sup>12</sup>其下論述其詩說的兩個特點：探究字源、考證詳實；探討詩旨，自有創見。並對其說加以檢討，包括新解求證之際，常有偏執現象；好以廋語說詩，旨趣流於卑下；好以喻義說詩，解釋益見附會等。文章舉證立說，論點鮮明，故被林慶彰選入《詩經名著評介》，<sup>13</sup>成為論述《詩經》的代表性論文之一，此書曾用為大學中文系的輔助教材，因而帶動其論點的流傳，後之論著頗見依循其說。

1988年，季旭昇寫有〈詩經周南「兔置」篇探究〉，<sup>14</sup>羅列諸家說解，對聞一多之說有所評論。又於1994年發表〈評聞一多《詩經》論著中的古文字運用〉，<sup>15</sup>以現代甲骨學和古文字學知識指出，聞一多對古文字的認識尚屬初步，用以闡釋《詩經》有其不足之處。季旭昇的專長為語言文字學，以之治《詩經》，所著《詩經古義新證》，運用古文字學及考古學考證《詩經》字句的古義，兼有典章制度、史事、民俗等的探看，門徑頗與聞一多接近，<sup>16</sup>故以古文字學為角度加以評述。

1994年，侯美珍寫作《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研究》，<sup>17</sup>因為聞一多說解《詩經》較為細瑣、未成體系，此書擇定四個主題論述：一為〈是蠹魚還是芸香？——談聞一多的「學者」角色〉，由聞一多晚年的自白切入，釐清

9 同前註，〈國風·邶風·匏有苦葉〉，頁217-218。

10 裴普賢，〈詩經時代嫁娶季節平議〉，收入裴普賢，《詩經研讀指導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77），頁152-158。按，此文原載於《幼獅月刊》44:1（1976.7）：4-6。

11 趙制陽，〈聞家驊詩經論文評介〉，《孔孟學報》42（1981.9）：231-253。

12 同前註，頁231。

13 林慶彰編，《詩經名著評介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），頁321-349。

14 季旭昇，〈詩經周南「兔置」篇探究〉，《國文學報》17（1988.6）：9-32。

15 季旭昇，〈評聞一多《詩經》論著中的古文字運用〉，《經學研究叢刊》第2輯（中壢：聖環圖書公司，1994），頁211-252。

16 季旭昇，《詩經古義新證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1），書前夏傅才〈評《詩經古義新證》——代序〉，謂：「我曾經提出聞一多創始了《詩經》新訓詁學，把季旭昇教授的《詩經古義新證》定位為聞氏《詩經》新訓詁學的繼承和發展」。按，此文原發表於《漢學研究》（第6卷1期，頁373-380，1998年6月），其觀點尚待商榷：其一，以古文字學治《詩經》，由來已久，不始於聞一多。其二，季旭昇以古文字學治《詩經》在前，之後才評述聞一多之說，應非對之繼承和發展。附載於此。

17 侯美珍，《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研究》（臺北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4；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0）。書中〈是蠹魚還是芸香？——談聞一多的「學者」角色〉，發表於《人文學報》17（1995.4）：77-93。〈古典的新義——談聞一多解《詩》對佛洛依德學說的運用〉，發表於《經學研究論叢》3（1995.4）：103-132。

其學者與鬥士的角色。一為〈古典的新義——談聞一多解《詩》對佛洛依德學說的運用〉，爬梳其接觸佛洛依德學說的經過，對其偏執附會之處有所省思。一為〈《詩經》時代嫁娶正時論——聞一多觀點的商榷〉，爬梳歷代學者對嫁娶正時的討論，照會聞一多之說，擇定春秋時代嫁娶應是通年聽婚的觀點。一為〈《詩·新臺鴻字說》研究——兼論聞一多的治《詩》方法〉，針對其論文〈《詩·新臺鴻字說》〉，考察現代學者的意見，歸結於聞一多所論證據薄弱，後學應「批判地繼承」。<sup>18</sup>

此書採主題論述，雖為畫龍點睛，但對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的討論尚未全面，惟此書為臺灣通論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的先聲，對歷代經說、兩岸資料多有掌握，並於〈結論〉提到寫作狀況：「如果問寫這篇論文最困難的地方在那裡？筆者以為，先前研究者對聞一多的頌揚、肯定，是筆者覺得最棘手、最沉重的負擔。這幾年來，因為自己的判斷與學者們的頌揚有極大的落差而感到困惑不已；與眾為敵，讓我常常不安的省思是不是我錯了」，終而認為「聞一多的著作，才是他最好的代言」。<sup>19</sup>於此亦可窺知中文學界新一代研究者的立場，在論述民國時期政治爭議人物時，面臨到兩岸的評價兩極，都不希望捲入政治，而是力求持平客觀的討論。

2002年，陳文采博士論文「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」，按《詩經》學發展過程敘述，將聞一多置於第三章〈新材料的出現與《詩經》考證學的更新〉之〈古文字學與《詩經》訓詁的創發〉討論，強調其「匯通文字與文化的論證法則」、「破譯『初期文藝之慣技』的訓詁工作」

的特色，說明其銳意求新、推求太過、甲骨文知識仍有不足等缺點，<sup>20</sup>對於其編纂《詩經字典》的構想也有述及。

2007年以後，呂珍玉、許瑞誠、朱孟庭、林素娟等皆有論文闡述。呂珍玉《詩經訓詁研究》的第四章為〈聞一多的詩經訓詁商榷〉，<sup>21</sup>肯定聞一多說《詩》，也指出其過度新詮、任意改字、隨意比附詞語等缺失。又有系列研究〈聞一多《詩經詞類》刊誤〉、〈聞一多說《詩》中的原始社會與生殖文化〉，<sup>22</sup>前者介紹《詩經詞類》的撰寫緣起、體例，予以刊誤及補充，並對學界普遍以向熹《詩經詞典》為首部音義兼備的《詩經》詞典，強調聞一多早有構想。後文則就原始社會的性欲、婚姻與社會、生殖崇拜、生殖符碼等方面，探討聞一多泛性說《詩》的特色。

許瑞誠碩士論文「聞一多《詩經》詮釋研究」，<sup>23</sup>認為聞一多說《詩》特點主要展現在訓詁、原始主義、文學三方面，其說有缺失也有建樹，包括：議定舊說之是非、證成前人之訓釋、開新研究方法之途徑、轉經學為文學之視角等。另有〈從《詩經》探究先民對日、月、星的認識〉、〈聞一多的《詩經詞類》商榷〉等系列研究，以及博士論文《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探微》，<sup>24</sup>通論聞一多唐詩學，論述其研究唐詩的因緣、選唐詩的文學史觀、對唐詩的訓詁考據等，為兩岸學界首部以聞一多為題的博士論文。

朱孟庭有〈聞一多論《詩經》的原型闡釋〉、〈經典的文化詮釋——論聞一多《詩經》的婚嫁民俗闡

18 侯美珍，《聞一多《詩經》學研究》，頁118。

19 以上引文同前註，頁113。

20 陳文采，〈新材料的出現與《詩經》考證學的更新〉，「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」（臺北：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2），頁333-334。

21 呂珍玉，〈聞一多的詩經訓詁商榷〉，《詩經訓詁研究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226-232。

22 呂珍玉，〈聞一多《詩經詞類》刊誤〉，收入《語言文字與文學詮釋的多元對話》（臺中：東海大學中文系，2011），頁407-443。〈聞一多說《詩》中的原始社會與生殖文化〉，《臺北大學中文學報》13（2013.3）：33-63。

23 許瑞誠，「聞一多《詩經》詮釋研究」（臺南：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7）。

24 許瑞誠，〈從《詩經》探究先民對日、月、星的認識〉《第三屆青年經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高雄：昶景文化公司，2008），頁91-110。〈聞一多的《詩經詞類》商榷〉，《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》1（2008.3）：181-206。〈聞一多《詩經》重言詞訓釋商榷〉，《東方人文學誌》7：2（2008.6）：227-245。《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探微》（高雄：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14；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7）。

釋〉，<sup>25</sup>前文所謂「原型闡釋」指運用「隱語」與「神話」解《詩》，後者則就婚前、婚禮、婚後闡釋，二文立足於前人之說，綜評優缺點。

林素娟〈豐產儀典與始祖傳說——聞一多古籍詮釋之特色及其對古禮儀研究的啟發〉，<sup>26</sup>認為古禮儀的社、禘之祭皆出於女始祖高禘之豐產儀典，因此由豐產儀典與始祖傳說立論，分析聞一多巧妙透過隱語、興以思考古文化和古禮儀的課題，並謂其「受弗雷澤等人類學式的視野，以及功能學派馬林諾夫斯基、社會學派涂爾幹、心理學如弗洛伊德……視野影響，對於古史、禮俗之研究有別於傳統而另闢蹊徑。其將《詩經》作為社會史料、文化史料進行探討，較傳統由經學、歷史、文學等研讀角度更形豐富」。<sup>27</sup>此文亦指出聞一多的研究路徑開啟了學者對於伏羲、女媧、洪水的研究興趣，對古文化、古禮儀的研究多有啟發。

除了各別學者的研究，1999年10月23日值聞一多百週年誕辰，兩岸清華大學共同召開「紀念聞一多先生百週年誕辰國際研討會」。這是繼1997年「王靜安先生百二十週年誕辰國際研討會」之後的盛會，會後出版《新古典主義——紀念聞一多先生百週年誕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由朱曉海主編，書前〈弁言〉針對聞一多的學術有謂：

先生治學典範殊堪光表，為吾人踵武。先生諸說一二今容或可商，然星周幾四，於我輩寧非應然者耶？可誇安在哉？設使猶轉有未企，洵愧對先賢矣。<sup>28</sup>

研討會徵稿明言「不懼僻冷艱深」，作者包括胡萬

川、楊儒賓、洪國樑等，皆一時之選，可惜論文中未見針對聞一多專論，而是結合各自學術專長，在聞一多專擅的神話學、經學、古文字學等領域擬題撰述，猶如以個人所學與聞一多「對話」，也表達致敬之意，朱曉海即有感而謂：「緬惟在昔先生於國民黨轄區內見戕，四十三年後，乃於其政權範圍下四方雲集撰文追仰，歷史發展大勢之終不可抑昭然日下。魂兮歸來，庶幾引慰。」<sup>29</sup>

### 三、現代文學角度——對聞一多現代詩與詩論的評述

1966年，梁實秋在《傳記文學》雜誌發表〈談聞一多〉系列文章，<sup>30</sup>記錄抗戰前的聞一多、詩人學者的聞一多，但對於他在昆明時期的生活經歷與政治態度，則以所知不多而未觸及，這雖是實情，卻也規避了敏感的政治問題。系列文章集結成專書《談聞一多》，書中對聞一多詩觀的形成多有敘述，如抄錄其學生時期批評俞平伯（1900-1990）新詩的〈冬夜評論〉，抄錄1922年10月27日來信中的〈憶菊〉詩，<sup>31</sup>都是第一手史料。又如提到「對於新詩，他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〈女神〉，他不能贊同的是胡適之先生以及俞平伯那一套詩的理論。據他看，白話詩必須先是『詩』，至於白話不白話倒是次要的問題」，<sup>32</sup>均為親身見聞，故被研究者重視及引用，如陳敬之所寫〈聞一多〉，即多取材於此<sup>33</sup>。梁實秋在書前第一節，比較了聞一多與徐志摩，有謂：

在臺灣，知道徐志摩的人比較多，他的文字也有

25 朱孟庭，〈聞一多論《詩經》的原型闡釋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18（2007.10）：77-79；81-115；〈經典的文化詮釋——論聞一多《詩經》的婚嫁民俗闡釋〉，《鵝湖月刊》408（2009.6）：19-28。

26 林素娟，〈豐產儀典與始祖傳說——聞一多古籍詮釋之特色及其對古禮儀研究的啟發〉，《中國學術年刊》，34（2012.3）：133-164。

27 同前註，頁157。

28 朱曉海主編，〈弁言〉，《新古典主義——紀念聞一多先生百週年誕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1），頁II。

29 同前註。

30 梁實秋，〈談聞一多〉，《傳記文學》9：2-6（1966.8-12）：27-32；38-42；21-25；29-32。

31 梁實秋，〈談聞一多〉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67），頁10-11；19-25。

32 同前註，頁9。

33 陳敬之，〈聞一多〉，《「新月」及其重要作家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0），頁72。

被選入教科書的，他雖然沒有正式的全集行世，但坊間也翻印了若干散集，也有人寫過他的風流韻事；聞一多是有全集的，朱自清、吳晗、郭沫若、葉聖陶編，上海開明書局印行，但是在臺灣是幾乎無法看到的。因此，年輕一些的人對於死去不過剛二十年的聞一多往往一無所知。<sup>34</sup>

可見 60 年代臺灣社會大眾對聞一多的陌生，這種情形並未改變，十年後陳敬之所寫〈聞一多〉仍謂：「儘管自聞一多之死迄於現在，只有短短的三十年年頭，但由於他的著作在今日臺灣的書肆坊間既已無法看到，而在各種雜誌報章裏，又鮮有人為文談論過他，故就今日自由中國的一般知識青年朋友們來說，匪僅對聞一多的生平很難找得到有幾個完全瞭解的人，即連知道『聞一多』這個名字的，恐怕也少而又少。」<sup>35</sup>

學界從現代文學角度研究聞一多，主要係評論其詩作與詩論，余光中〈聞一多的三首詩〉發表於 1977 年，<sup>36</sup>篇幅不長，僅抽樣評論〈忘掉她〉、〈國手〉、〈愛之神——題畫〉三首詩，然評論標準頗為嚴格，謂：「其實聞一多距離大詩人之境尚遠」，理由有二：一為作品太少，只留下《紅燭》、《死水》兩部詩集，而作品中真正耐人尋味的亦不多。一為他的格律詩理論「太淺顯單純，用來糾正胡適、冰心等的散漫也許有效，但賴以開啟謹嚴而完整的詩體，則仍嫌不足。」<sup>37</sup>此文是詩人評價詩人，故而深受矚目，為臺灣學界早期專論聞一多詩歌的要作。

同一年，陳芳明寫作〈盛放的菊花——聞一多的詩與詩論〉的初稿，日後於 1984 年重訂發表。<sup>38</sup>其將聞一

多置於中國新詩史上不容忽視的位置：

他的創作，不僅為自由詩與格律詩提供了很好的榜樣；同時，他的詩觀也為這兩種詩體，尤其是格律詩，找到了理論根據。<sup>39</sup>

文章分別評論聞一多在自由詩、格律詩階段的理論與作品，論述視角有其獨特，如謂「《紅燭》時期的作品，充滿了各種色彩」、「以顏色為意象，構成詩中複雜的感情」、「對生命的歌頌，色彩的著迷，感情的嚮往，是聞一多自由詩階段的最大特色」<sup>40</sup>等。文末針對聞一多由早期自由詩、中間格律詩，最後又回到自由詩的歷程，評謂：「聞一多的進步並非是突變，而是經過『正反合』相剋相生的漸變」、「每一階段的表現，都與當時的主流密切結合，與其他詩人相較，聞一多的重要性特別突出」，最後引朱自清的評語，定位聞一多「始終是一個詩人」，早期是自由詩的浪漫詩人，接著是格律詩的浪漫詩人，最後是戰鬥詩的浪漫詩人，而其新詩成就並不止於兩冊詩集而已。<sup>41</sup>此文篇幅甚長，是作者早年的學術力作之一。

1980 年，陳敬之《「新月」及其重要作家》有專章〈聞一多〉綜評其人，主要論點有三：一為視其身亡事件「竟是出於共匪的刺殺而嫁禍於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苦肉計」，所據為張君達在《天天日報》的文章。一為引梁實秋《談聞一多》之說：「他相當重視佛洛伊德的學說，但並未使用這一個學說來解釋所有的詩篇」，評議其於古人音韻訓詁之外，再運用西洋近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以解釋《詩經》，為學獨到而深入。一為綜述其現代詩成就，以為「實又有勝於他在一般學術方面的成就

34 梁實秋，《談聞一多》，頁 31。

35 陳敬之，〈聞一多〉，《「新月」及其重要作家》，頁 71。

36 余光中，〈聞一多的三首詩〉，《青青邊愁》（臺北：純文學出版社，1977；臺北：九歌出版公司，2010），頁 187-196。

37 同前註，頁 187。

38 陳芳明，〈盛放的菊花——聞一多的詩與詩論〉，《文季》1: 6 (1984.3): 12-33，按，此文以筆名「宋冬陽」發表，後收入《典範的追求》（臺北：聯合文學出版社，頁 163-202，1994），文末小字註謂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初稿，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重訂」。

39 陳芳明，〈盛放的菊花——聞一多的詩與詩論〉，《典範的追求》，頁 163。

40 同前註，頁 178。

41 同前註，頁 196、197。

者。」<sup>42</sup>

1990年，筆者在《國文天地》策劃「月升月落話新月」專輯，邀請學者討論新月詩派，其中呂正惠〈聞一多的成就有多少？〉為聞一多的專論。文章在余光中〈聞一多的三首詩〉的基礎上提出新見：

余光中說：「他（聞一多）的作品之中真正耐人尋味的，恐怕也不過〈洗衣歌〉、〈一句話〉、〈也許〉等這麼幾首。」這當然是別有用心的苛評，意在證明臺灣現代詩人的成就勝過三十年代諸名家。但是，《死水》一集並非首首佳作，這倒是事實。按我個人估計，佳作大約在一半左右，也就是說，大概有十四、五首。如果再加上《紅燭》裏的少數幾首及未入集的〈奇蹟〉，那麼聞一多「真正耐人尋味」的詩作，可能不會超過二十首。以這種數量來看，聞一多的成就確實單薄了一些。<sup>43</sup>

在這個評述觀點上，呂正惠進一步以兩個角度定位聞一多的寫作成就：一為其他具代表性的詩人能寫出像聞一多那「二十首」的水準的並不多，聞一多「成就」的「單薄」並不證明其地位被高估，反而更證明了五四以後新詩的整體成績並不很令人滿意。一由「歷史」的視角而言，則聞一多對中國新詩的發展深有貢獻。文章最後列舉心目中「聞一多詩選」的目錄，亦即其認定的

聞一多詩歌「佳作」名單，作為本文立論依據，也提供讀者檢驗。<sup>44</sup>

1995年，邵玉銘〈為何千古文章未盡才？——論聞一多的詩與政治〉，<sup>45</sup>為《創世紀》詩刊四十週年晚宴的致詞。邵玉銘曾於1987年到1991年擔任行政院新聞局長，此時回任政治大學教職。文章將聞一多的「詩」與「政治」並論，文末則強調：「如果聞一多不在1946年去世，以他激越的個性，對人民的摯愛，對國家的未來的深切期許，當他看到大躍進的慘況，看到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暴亂，他一定還有第四次的大轉變。」<sup>46</sup>由於此文發言身分與場合頗為特殊，可一窺90年代臺灣政界、學界的解讀觀點。

1996年，龔顯宗有〈聞一多詩論初探〉、〈聞一多的詩律與創作〉，<sup>47</sup>前文擇定聞一多論新詩之所以為新、論新詩由質而靡、論格律、論哲理不宜入詩等加以探討，後文則針對理論實踐，分就格律說與創作、格律說與實際批評二端討論。

2000年以後，對聞一多現代詩與詩論的討論增多，主要有專論與合論兩種論述方式。專論聞一多者，如楊昌年〈聞一多與格律詩〉、林淑娟《聞一多的原始主義》、吳適均《聞一多「詩三美」理論研究》、趙衛民〈聞一多的幻象詩學〉等，<sup>48</sup>又有許琇禎編《聞一多》詩文選。<sup>49</sup>其中，林淑娟《聞一多的原始主義》首章〈另

42 以上分見陳敬之，〈聞一多〉，《「新月」及其重要作家》，頁96、81-82及85。按，關於聞一多被刺身亡有多種說法，此為其個人之見。

43 呂正惠，〈聞一多的成就有多少？〉，《國文天地》61（1990.6）：47-48。

44 同前註，頁48。

45 邵玉銘，〈為何千古文章未盡才？——論聞一多的詩與政治〉，《聯合報》37（1998.1.8-11）。

46 同前註，《聯合報》37（1998.1.11）。

47 龔顯宗，〈聞一多詩論初探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理論》1（1996.3）：112-121；〈聞一多的詩律與創作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理論》3（1996.9）：439-447，二文收錄於《從臺灣到異域：文學研究論稿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7）。

48 楊昌年，〈聞一多與格律詩〉，《歷史月刊》159（2001.4）：117-120；林淑娟，《聞一多的原始主義》（新竹：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4；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16）；吳適均，「聞一多『詩三美』理論研究」（新竹：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5）；趙衛民，〈聞一多的幻象詩學〉，收入《新詩啟蒙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頁54-62，2011）。按，2000年以後有海外學者的專論在臺灣發表，如李子玲，《聞一多詩學論稿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0），此書原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85年碩士論文。又有澳門大學學者鄭振偉，〈孤獨和聞一多的詩歌創作〉，《臺灣詩學學刊》7（2006.5）：153-196、香港學者黃維樑〈五四詩人聞一多：浪漫性格和古典詩觀〉，《文訊》282（2009.4）：96-99，附見於此。

49 許琇禎編，《聞一多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6），為《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》叢書之一，書前附導讀，全書分〈新詩卷〉及〈散文卷〉，末附年表。〈新詩卷〉選詩〈劍匣〉等二十七首，〈散文卷〉則僅選〈青島〉、〈五四聯想〉二篇。

一個視角〉，評述聞一多的生平及思想，視其悲劇收場為「讓個人與歷史的連結達到了最高點」，但以為其始終與政治有段距離：

聞一多在政治立場上的矛盾與徘徊，正可以說明他從不著意於政治，那些政治立場之於他，其實也只是在某些特定時期，他認為對國家人民最有幫助者。<sup>50</sup>

此說可見還原聞一多詩人身分的意圖，全書即分就三端闡述聞一多詩歌、藝術與神話研究所展現的原始主義：一為〈詩歌中的陰影與象徵〉，包括紅燭、死水、蝙蝠與黃昏、蛇與黑夜、幻象與神祕性等。一為〈藝術創作與原始美學〉就裝飾藝術、紅與黑、旅程印象等討論。一為〈神話與溯源〉，就史詩與「西方」、伏羲與共祖、生之本源等探討。最後以〈回歸·新生〉總結。此書所論雖非前無依傍，但論點相當鮮明，論述頗自信有力，其後於2016年出版，指導老師楊儒賓之序〈烈士之外〉亦可注意：

古典的聞一多與政治的聞一多是同一個聞一多，聞一多是分裂的，因為時代分裂了；聞一多是病了，因為民國也病了。本性帶有強烈古典性格的詩人遂不能不不由自主地成為烈士，雖然烈士的勳章是特務打造的，但未嘗不是他自己的選擇。<sup>51</sup>

〈烈士之外〉意在以不同視角還原聞一多的面目，此文可略窺臺灣中文學界早期雖因政治干擾而多有隱諱

或視角的考慮，但新一代的研究觀點趨於拋開表象，由不同的角度切入，意欲省視更多面向、更為深層的聞一多心靈世界。

將聞一多與其他詩人合論者，如呂怡菁〈譜在世紀交錯的狂濤——聞一多、郭沫若詩歌「河」、「海」意象的時代特徵〉、王詠絮《現代詩人中的仙、聖、鬼——論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戴望舒詩及其詩論》、歐俞君〈一灣新月照紅塵——論新月派詩人聞一多、朱湘〉、劉正忠〈墳墓，屍體，毒藥：新月詩人的魔怪意象——以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朱湘為主〉、陳學芬〈聞一多的「三美」理論與趙天儀的詩美表現〉等。<sup>52</sup>

其中，呂怡菁之文透過分析詩作意象，指出在空間上，「河」往往代表中國，「海」則代稱世界或宇宙；在時間上，「河」指向過去，「海」則望向未來。而聞一多與郭沫若對「河」、「海」的運用，則體現了由封閉自卑到開放自得的五四時代之聲。<sup>53</sup>

劉正忠之文，跳脫以往對新月詩人的評論窠臼，以墳墓、屍體、毒藥三個相互連鎖的「魔怪意象」作為觀察焦點，析論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朱湘詩作的共同屬性：「一、詩人面對垂死的中國，愛恨交織，神魔共構，經常萌生一種處於『如墓的子宮』的空間感受。二、無力改變現實的挫敗與憂鬱，使抒情自我產生『腐爛的身體感』。但講究修飾的藝術傾向，又彷彿給腐屍穿上了外衣。三、時代壓力使詩人主體變形，逼出一種兼融怨恨與救贖的『毒藥似的語言』，逐漸發展為新的詩學範式」。<sup>54</sup>除了總論，文中對於聞一多的分論亦能闡發幽

50 林淑娟，《聞一多的原始主義》，頁2。

51 同前註，楊儒賓，〈烈士之外〉，頁II-III。

52 王詠絮，「現代詩人中的仙、聖、鬼——論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戴望舒詩及其詩論」（高雄：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8）；呂怡菁，〈譜在世紀交錯的狂濤——聞一多、郭沫若詩歌「河」、「海」意象的時代特徵〉，《國文學誌》9（2004.12）：201-229；陳學芬，〈聞一多的「三美」理論與趙天儀的詩美表現〉（《臺灣現代詩》21（2010.3）：33-45；歐俞君，〈一灣新月照紅塵——論新月派詩人聞一多、朱湘〉，《豐商學報》13（2008.6）：50-79；劉正忠，〈墳墓，屍體，毒藥：新月詩人的魔怪意象——以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朱湘為主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2（2008.12）：119-160。按，韓籍研究生金尚浩寫作博士論文「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」（高雄：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1999；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0），係合論郭沫若、徐志摩與聞一多。又有香港學者史言，〈沮喪與孤獨的色彩空間：聞一多、鄭愁予詩歌「黑」、「白」特質下的孤獨感研究〉，《臺灣詩學學刊》9（2007.6）：249-295、香港學者陳智德，〈暗夜燭火：朱自清與聞一多的新詩史料整理〉，《文訊》282（2009.4）：96-99，附見於此。

53 呂怡菁，〈譜在世紀交錯的狂濤——聞一多、郭沫若詩歌「河」、「海」意象的時代特徵〉，頁203。

54 劉正忠，〈墳墓，屍體，毒藥：新月詩人的魔怪意象——以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朱湘為主〉，頁119。



微，如評述〈靜夜〉：

精確地說，這首詩的內部有著三層的同心圓：大墓室（中國）包著子宮（家庭），子宮裏又包著小墓室（身體）。繁複的空間結構，有力地呈現了讚美與咀咒的衝突，和諧與騷動的衝突，家庭與國族的衝突。余光中六十年代膾炙人口的〈雙人床〉、〈如果遠方有戰爭〉、〈母親的墓〉、〈有一個孕婦〉等詩，相當程度上便是繼承並發展了此種結構，只是以更精微的語言技術，強化了關於「中國—母親—墳墓」的主題。不過，聞一多的國族書寫經常帶出一個「黑暗自我」，這與余光中的「光明自我」頗不相同。<sup>55</sup>

劉正忠即詩人唐捐，擁有寫作經驗與學術歷練，透過精細分析詩作，論述聞一多的影響，甚而指導閱讀，如指出《死水》所收二十八首詩，在編次上明顯地以類相聚，集中於女人、死亡、中國幾個子題，這些子題是彼此關涉、互為隱喻的，因此，「本文提議把整本《死水》讀為一首長詩，則整體性的認識，將有助於我們多片段進行創造性的詮釋」。<sup>56</sup> 劉正忠的「提議」，可謂轉換閱讀視角，意圖讀出聞一多詩作中的私祕潛流，而這也是其論文令人驚豔之處。

2009年，齊邦媛的回憶錄《巨流河》第五章〈勝利——虛空，一切的虛空〉，記錄抗戰勝利的經過，尤其引錄聞一多詩歌〈也許〉，描述當時所感受的觸動，進而發問：「身為青年偶像的他，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？」並對其遇刺事件表達看法：

聞一多之死成了全國學潮的策動力量，對延安的中共而言，他的助力勝過千軍萬馬，對於中國的命運更有長遠的影響。因為他所影響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，更值得文化史學者的研究，但

是在目前兩岸的學術界，尚少見有超脫自身範圍的回顧與前瞻。<sup>57</sup>

《巨流河》於2009年7月出版，到8月即5刷，齊邦媛回憶一生「從巨流河到啞口海」，立論懇切，在臺灣頗有迴響。

最後由流行的選本《新詩三百首》進行考察。此書為張默、蕭蕭所編，<sup>58</sup> 選評海內外公開發表的華文新詩，分為四卷：〈大陸篇·前期（1917-1949）〉、〈臺灣篇（1923-1995）〉、〈海外篇（1949-1995）〉、〈大陸篇·後期（1950-1995）〉。聞一多位於第一卷，入選〈死水〉一首，編者〈鑑評〉謂：

聞一多在中國當代新詩壇被譽為「古典、唯美而又激進的詩人。」他的詩作聯結著我國古代詩、西洋詩和現代各詩派的技巧，同時能將音樂的美，繪畫的美，建築的美熔於一爐。……〈死水〉是聞一多最具代表性的詩作，歷來所有重要詩選幾乎無一漏列。……〈死水〉的藝術魅力，誠然發自詩人純真的特性，在那樣一個軍閥割據的年代，作者勇敢而含蓄地譜出了當時青年人絕望痛苦的心聲。……在新詩初期探求新格律的途程上，〈死水〉無疑是最佳的實驗品之一，值得借鏡。<sup>59</sup>

此書在臺灣詩壇具有影響，於1995年出版，1997年印刷三版，到2017年則進一步擴編為《新詩三百首百年新編》，<sup>60</sup> 卷帙重作分合，分為〈五四時期（1917-1949）〉、〈域外篇（1949-2017）〉、〈臺灣篇（1923-2017）〉。其中，中國大陸詩人列入〈域外篇〉，〈臺灣篇〉則分上、下編，而聞一多所在的〈五四時期〉，與前版〈大陸篇·前期〉的選詩、鑑評悉同，這可能是因聞一多詩歌已有定論，而詩壇後浪推前浪，繼起的作者眾多，故新編之版本著重處理。

55 同前註，頁127-128。

56 同前註，頁148。

57 齊邦媛，《巨流河》（臺北：天下遠見出版公司，2009），頁237-238。

58 張默、蕭蕭編，《新詩三百首》（臺北：九歌出版公司，1995）。

59 同前註，上冊，第1卷〈大陸篇·前期1917-1949〉，頁130-131。

60 張默、蕭蕭編，《新詩三百首百年新編》（臺北：九歌出版公司，2017）。

## 四、結 論

整體而言，臺灣研究聞一多的專論數量不多，此與其著作長期在臺灣未能公開出版流傳有關，其政治立場、遇刺身亡，亦帶來顧忌。但臺灣的研究仍有其獨特的視角：其一，研究者雖有年齡、身分或立場的不同，但多數的研究者希望能減少政治的疑慮與干擾，以客觀持平的評述視角與研究態度，就學術論學術，還原聞一多的本來面目。

其二，臺灣的聞一多研究有選題過於集中的問題，聞一多《詩經》學、現代詩與詩論最受到關注，許多論述別有新見，但亦不免出現引證略異而結論近似者。而對聞一多在《楚辭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莊子》諸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則相對缺乏論述。這個現象除了是其相關著作少見出版，還牽涉到其學術創說何在的問題，聞一多《詩經》學、現代詩與詩論確實是成就最高者，故成為選題

重點。惟今日研究仍有加深加廣的必要，並透過聞一多的研究命題，使民國時期的國學、文學能得到全面的觀察與評述。

其三，臺灣學界對聞一多的研究，還有學者研究趨向與能力的問題，特別是新一代學者較熱中研究現代文學、臺灣文學、影像文學等，民國人物的研究相對趨弱，不易成為選題主流。此外，研究聞一多的國學論著，牽涉古典學術的探源與理解，又有跨學科、跨方法論等研究能力的高要求，學者頗有不易入門之感，難於投入精力、皓首窮經、關照整體。

本文考察臺灣的聞一多研究論著，其實照會出自己眼界、學力的有限，既難以駕馭聞一多的生平、思想及創作，也無法跨學科的綜評前賢論述，僅希望能提供研究參考，誠如齊邦媛《巨流河》所說：「目前兩岸的學術界，尚少見有超脫自身範圍的回顧與前瞻」，<sup>61</sup> 還望學界多予匡正。

61 齊邦媛，《巨流河》，頁 238。

## Taiwan Fellowship

- Taiwan Studies    •Cross-Strait Relations Studies
- Mainland China Studies    •Asia-Pacific Studies    •Sinology

The Taiwan Fellowship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(Taiwan) to encourage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tnerships.

- Taiwan Fellowship offers one economy class roundtrip ticket and monthly stipends.
- The annual application period is from May 1 to June 30 (for grants for Jan.-Dec. the following year).
- The minimum duration of a fellowship is three months, and the maximum one year.

For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, please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:

<http://taiwanfellowship.ncl.edu.tw> or email: [twfellowship@ncl.edu.tw](mailto:twfellowship@ncl.edu.tw)

**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** 20 Zhongshan South Rd. Taipei, Taiwan 10001, R.O.C

TEL 886-2-2314-7321    FAX 886-2-2371-2126    Website:<http://ccs.ncl.edu.tw>